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七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7 冊

顏元李塉《論語》解經思想研究

李 智 平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顏元李塉《論語》解經思想研究／李智平 著 — 初版 — 台北
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序 2+ 目 2+27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七編；第 17 冊）

ISBN：978-986-254-176-0（精裝）

1.（清）顏元 2.（清）李塉 3.論語 4.學術思想

5.研究考訂

121.227

99002286

ISBN - 978-986-254-176-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七 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254-176-0

顏元李塉《論語》解經思想研究

作 者 李智平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顏元李塉《論語》解經思想研究

李智平 著

作者簡介

李智平（1978-），男。東吳大學文學士，東海大學文學碩士，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曾任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等校兼任講師。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著有〈老子與黃帝四經對「知」的態度淺析〉、〈論「王霸之辨」：黃帝四經與春秋繁露詮釋視域之比較〉、〈復反之道：老子與剝、復二卦詮釋視域的比較〉、〈義利之辨：《左傳》中義利概念的實踐與應用〉、〈援佛入老，以佛解老——試析馬一浮《老子注》義理體系的建構〉、〈聖人名實的轉移：從《老子》到《黃帝四經》的觀察〉等數篇學術論文。

提 要

本文研究動機與方向有以下幾方面的考量：以宏觀視野來看，《論語》一書在魏晉南北朝以至於宋代、清代時，都有很傑出的解經成果，在時代與學術氣氛影響下，呈現出紛然的詮釋內涵。本文擇取清初《論語》學趨勢作為發端，繼而整理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的走向，考察時代背景對當時學術的影響；從微觀視野加以審視，乃由顏李《論語》學為基點，並以學派形成、學理內涵、時代價值等勾勒出其經解特徵，橫向討論與清初學術思想間的關係。其身為清初重要思想兼解經家，立足在程朱、陸王對立面思惟下，對於理學過分重視內聖心性，展開現實的檢討。不同於當時多數學者或多或少受到前期理學影響，他們直探經典內涵，掌握本旨的解讀，希冀避免成為歷來解經成果的再詮釋。故於重視「習行」躬行實踐的治學前提下，對於《論語》價值的體認，與魏晉「援道入儒」以及宋代著重心性價值闡述，甚至是其後乾嘉考據學興起後的解釋，皆不盡相同。然而，界於漢宋學間的特性，反成其學術價值爭議的開端，故本文主要將透過顏李有關《論語》著述的相關內容，縱向研究「論語學史」在明末清初理學反動思惟下解經的時代意義，並橫向由《論語》註釋中，呈現顏李學術地位與價值。

原 序

從寫作之初的期待、徬徨、猶疑、不安到現在論文付梓，心中一切疑慮與壓力，總算能夠暫時鬆懈下來。當逐一校對內容字句，一頁頁仔細地翻看時，有時也很難相信自己終於完成碩士論文的撰寫，多少個徹夜未眠努力，在晨曦中昏沉睡去的辛苦，頓時間似乎也就值得了。

一年多撰寫歷程中，面臨的瓶頸與壓力，是外人難以體會且難以言喻的，從資料蒐集篩選，閱讀思索，再到落筆成帙，與時間的競賽就如此倉促展開。有時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往往需花上數日時間竭慮苦思，哪怕已是夜闌人靜累倒在床榻，只要新概念浮現，便得趕緊起身振筆疾書，深怕一閃神，錯失這靈光一現的機會。周旋在自己房間、不同圖書館察考資料，成為這一年主要的生活型態，白天獨自面對空屋，夜晚兀自關起房門敲鍵盤寫論文，沉悶欲室的生活幾度想要懈怠。不禁想起大學時教「詩選及習作」與「文學概論」的老師黃永武先生，他常提醒我們道：「作學問不是件輕鬆的事，要耐得住寂寞。」至此，方能體會出這份孤軍奮戰時的疲憊與煎熬。幸而這段艱辛日子中，擁有著家人與師長綿綿無盡的鼓勵與支持，伴我走過這段寂寞時日，堅定了完成碩士論文的決心。

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魏元珪先生。在魏師門下三年，老師認真作學問與教學的態度，學術研究的精闢見解，令我受益良多。此外，老師兼容道家老莊與易經哲學對生命豁達，道法自然而行的氣度，亦開啓了我在生活智慧與應事接物的啓發；再者，東吳大學江淑君老師，是我學習中國哲學的啓蒙者。她悉心負責的教學態度，不辭辛勞且無條件帶領我們創辦讀書會，引領我愛好哲學，進而研究之，並指引了我許多讀書與做人做事的道理。

此外，東吳大學羅麗容及蘇淑芬兩位老師，是學術研究與精神的導師，不時聆聽我訴說生活苦悶，並鼓勵奮發向上；東海中文系魏仲佑與呂珍玉老師愷切教誨，在求學過程中給予肯定，是激勵我研究的動力；尤不忝哲研所蔡仁厚老師，政治大學李增老師，前故宮文獻處處長吳哲夫老師等前輩學者所棄，容許旁聽的機會，以其豐富人生閱歷，拓展知識與處事之道；而台灣大學李存智老師與輔仁大學趙中偉老師，不時提供學術經驗與建議，愈加豐富了學習視野；中興大學教授王慶光老師、東海哲學博士陳政揚學長、宋定莉學姊、許惠珍學姊，中文所唐毓麗、莊凱雯學姊等諸先進，咸是寫作過程中陪伴在側的摯友，他們專注於學問的態度，都是足以仿效學習的對象，特此一併至上誠致謝意。

最重要的，是家人對我的包容與支持，方能完成這份論文。尤其是我的祖母及父母。而過世十餘載的祖父，雖已等不及親眼見到我的畢業，然而其為人剛正不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氣度，仍長存於心，謹以此拙作獻給他們。

凡 例

- 一、本文所引顏元、李塉著作原文，以台灣廣文書局版，北京四存學會排印的《顏李叢書》以及北京中華書局版《顏元集》為藍本，更就近賢之校釋中，擇善而從。
- 二、正文舉例時，為避免有孤證或引證不足之憾，將至少舉出二例以證明論點，如為孤證時，則於行文或註解中予以說明。
- 三、本文以釋意為主，不針對所引字詞做字義或訓詁上之解析，原文中屬於明白易懂者，則不加註解。
- 四、本文徵引書籍名稱時，採用現今通行之《 》符號，單引篇名時則用〈 〉符號。
- 五、本文採「當頁附註」，徵引古籍或諸子百家時，直接以註腳註明於所引該頁之下。附註的位置若是文句未結束時，加在逗點之前；已結束時，加在句點之後，以此作區隔。
- 六、本文注釋編號以「章」為標準，另起一章則重新編號。
- 七、再次徵引以「同前註」方式簡化處理，若徵引不連續時，同章節則列出書名或篇名，並註明頁數來表示。
- 八、本文引用他人學說時以單引號「 」為準，引號中原著者復徵引他人或古人學說時，以雙引號『 』為準。若引用資料較長，或為凸顯該引文，以「獨立引文」處理時，將從正文分出，另起一行低三格從第四格開始寫起，引文前後則不加引號。
- 九、徵引古人名字時，統一以「姓名」書寫，不另採用其字號、別號；若作者題名為字號、筆名、別名，在能查知其本名時，則將本名加上括

號，置於題名之後。

- 十、凡本文章、節名稱，以及徵引文章而加以闡述者，均以「標楷體」排印，以資醒目。
- 十一、各章節使用編次之符號，依一、(一)、1、(1)……等順序表示。
- 十二、本文所引主要參考書目，統置於全文之末，惟於每節註中特列參考之書名與頁碼，並附出版社名稱、版本以資參考。
- 十三、本文引用與參考資料，古典文獻方面，主要分成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與歷代四書、顏元李塉著作與後人專著等二獨立類別，排列方式依類而異，詳述於各小類之首；現代專著、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學位論文等按出版時間先後序列。



目

次

原 序	
凡 例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一、問題的發端	1
二、問題的提出	6
第二節 本文蓋範圍與研究價值	12
一、本文涵蓋範圍	12
二、本文研究價值	1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進路	15
一、研究的方法	15
二、研究進路	19
第一章 時代學術氣氛之省察	23
第一節 外緣背景之於儒學的影響	23
一、動亂頻仍的明清之際	26
二、社會思潮對儒學的轉變與衝擊	34
第二節 明清之際儒學課題發展方向	39
一、經世儒者對於宋明理學家批判略述	41
二、儒學主客關係的調和與經世實學的提出	45
第二章 顏元李塉生平及其學術思想特徵	53
第一節 顏元生平梗概及其學術淵源考探	53
一、生平及其治學歷程概述	53
二、思想的淵源與傳承經典	61
第二節 李塉生平概述及顏李學術傳承辨析	66
一、生平及其治學概述	66
二、顏李學派的傳承與別異	71
第三章 經典暨《論語》的時代詮釋	79
第一節 詮釋學觀點下《論語》之釋義目的	79
一、經世觀點下經典的再詮釋	83
二、由朱熹至清初《論語》學的時代詮釋	88
第二節 顏李《論語》相關著作概述	99
一、顏元《四書正誤》	100
二、李塉《論語傳註》與《論語傳註問》	110
第四章 《論語》解經思想中的政治觀	119

第一節 經世實學家的政治關懷	121
一、時代氛圍下的氣節表徵	121
二、經世實學家的政治理念	133
第二節 《論語》中經世政治觀的分析	138
一、諸註分析	138
二、綜 論	155
第三節 政治觀解經思想的批評及平議	157
一、政治原理與顏李之前《論語》解經觀念 的商榷	157
二、顏李《論語》政治觀批評與平議	161
第五章 《論語》解經思想中的教育觀	165
第一節 經世實學家的教育理念	168
一、崇實抑虛的教育觀	168
二、以儒經爲本的教育內涵	172
第二節 《論語》中教育觀的分析	177
一、諸註分析	177
二、綜 論	198
第三節 教育觀解經思想的批評與平議	199
一、德育思想與顏李之前《論語》解經觀念 的商榷	199
二、顏李《論語》教育觀的展現與說明	204
第六章 《論語》解經思想論天人之際	209
第一節 經世實學家的天人思惟	211
一、經世實學家論天道	211
二、經世實學家論人性	215
第二節 《論語》中天人觀的分析	220
一、天道觀的分析綜論	220
二、人道觀的分析綜論	228
第三節 天人觀解經思想的批評與平議	248
一、《論語》文本與顏李之前《論語》解經 觀念的商榷	248
二、顏李《論語》天人觀的時代性格與批評 平議	253
第七章 結論及未來展望	259
引用與參考資料	265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問題的發端

中國圖書的分類始於西漢成帝令劉向、歆父子整理校讎典籍與劃分目錄

〔註1〕，《漢書·藝文志》大序記載云：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管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

又南朝阮孝緒〈七錄序〉云：

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譌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

〔註1〕「目錄」，目：指一書的篇目；錄：指一書的提要，其中又包含講學術流別的小序和說明內容大旨、作者生平、該書得失的敘錄。中國目錄學包含校讎學，從書目到寫成敘錄爲止，先校讎乃至於編訂目錄，是一貫的流程。雖然先秦時已經有圖書的整理，但目錄學體例完備，仍待劉向歆父子的完成。詳參呂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錄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0月），頁1～18；李瑞良，《中國目錄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頁1～39。

從「輒條其篇目」可知劉向透過校勘，以考定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撮其指要」則不單是校讎，更要將典籍約略作介紹而成〈敘錄〉。他們以六分法作分類，並置〈六藝略〉於各部次之首，為後世目錄學傳承。收錄內容有六經、《論語》、《孝經》、小學共九類，後來四分法列有「經部」，涵蓋範圍承繼之。四分法起源於西晉荀勗《中經新簿》以甲、乙、丙、丁代表經、子、史、集。東晉李充更在其基礎上，將子、史二部次調換，訂立了以經、史、子、集為序的四分法〔註2〕，自此被以後官修目錄所承襲，直到晚清西學傳入與西洋圖書分類影響中國目錄學，傳統四部分類不敷使用，逐漸式微。

「經部」不同於其他部次依性質歸類，它純指古代儒家典籍，性質上也兼涵其他各類內容，形成中國圖書分類最特殊之處。經學逐步的獨大要追溯到西漢初年惠帝廢挾書令開始〔註3〕，文景二帝繼之，百姓獻書途徑大開，文帝更立四經博士，洎漢武帝建元五年根據公孫弘建議，立五經博士，而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興起〔註4〕，儒學地位躍升取代漢初黃老刑名之學，

〔註2〕 中國圖書分類在魏晉時的四部分法並不成熟。由於荀勗四部分法只重視著作體裁的劃分，忽略圖書的本質，故造成許多圖書難以歸類而勉強為之劃分的窘況，況且只列書目，更無從考證其源流。反觀劉歆《七略》能著重書的「本質」，以學術內容來歸類，是其優點。所以南北朝到隋代為止，又產生了以劉歆七略為基礎的七分法，與四部分類相抗衡。七分法中又以南朝宋王儉的《七志》、梁阮孝緒的《七錄》為要。直到唐代魏徵以四部為綱，並兼採《漢書·藝文志》及《七志》、《七錄》之長，訂立了《隋書·經籍志》，此後四部分法終告成熟，雖然其後目錄類目有所增訂，然此後官修目錄皆依此而定，到清乾隆四十七年完成編修的《四庫全書總目》，而為四分法之最。詳細內容參見前註二書。

〔註3〕 《隋書·經籍志》經部大序云：「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嘆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禮壞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由此以知經學自戰國以來諸子百家興盛與秦代焚書而式微，典籍散佚，及至西漢以後經學才復盛。

〔註4〕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經學發展於整個中國文化史的重要關鍵，事件的發生，確立了之前百家爭鳴的時代過渡到儒學獨尊的地位。按照司馬光，《資治通鑑》採《漢書》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一語，斷定「獨尊儒術」發生在漢武帝時。不過現代學者採取了保留態度，從當時社會風氣與學術文化看來，認為當時官方規定的五經是唯一經書系統，故所有知識都必須和經書作協調，故諸子百家語只是經書的「傳」或「記」；另外，《漢書》又云：「罷

學術上百家爭鳴也漸而定於一尊，形成兩千年來儒家經典特出於其他學術的重要分期。

「經」在中國學術的特殊性，從目錄學上單獨成一部類，且列於眾部之首，可見端倪。大陸學者周予同先生認為「經」不外是有政治需求的考量、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能符合政府提拔統治人才的準繩三項特點等。他站在統治與群眾階級對立上提出看法〔註5〕，頗有值得商榷之處〔註6〕，且看《漢書·藝文志》云：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道，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德，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隋書·經籍志》經部大序云：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

黜百家，表章六經」，並非獨尊儒術，只是將六藝地位提升到諸子百家以上。至於真正的「獨尊儒術」是在漢成帝以後。以上詳見王葆玟，《西漢經學源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6月），頁103～153。此處仍遵循以往說法，將「獨尊儒術」定位在漢武帝時，並置列疑義之說，以待後出文獻資料能更完整證明或質疑。

〔註5〕參見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經學」、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頁650～661。撰者將三點予以簡化著於行文中。周予同以社會主義角度詮釋「經」的特點，認為「經」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它有助於統治階級的統治，是一種利用孔子代表的儒家思維進行文化教育的統一與箝制思想的工具。

〔註6〕周予同的說法，忽略了中國自孔子以來「述而不作」的觀念傳承，而且以注經方式進行哲學體系建構，本來就是中國歷代思想家與經學家慣用的詮釋傳統，這些含有「哲學性的詮釋」、「詮釋性的哲學著作」也不僅止於儒家經典。矧歷來「經」的註解不一定全然列於學官或科舉考試，諸如清初顏李學派與毛奇齡等大儒，站在與當時立為科舉考試項目的朱子學相對立場著書議論其謬誤，闡述已見，又何嘗單作為統治的工具。雖然他在文末〈中國經學史研究特點〉一節中，特別列出「個別學者的思想不屬於統治階級」一點作為補充，卻仍僅由封建制度的需求下而有經典的反覆詮釋，疏甚關懷到儒學內部可能產生的演變等缺憾。有關詮釋部分，可參見劉笑敢，〈經典詮釋與體系建構——中國哲學詮釋傳統的成熟與特點易議〉，《中國哲學史季刊》（2002年1月），頁32～40。

又《四庫總目提要》經部總敘云：

經秉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

《漢志》從五經配五常之道以言經典，是受到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以仁、義、禮、智、信等日常修德之教說明五經，足見「經」非泥古不變，而是切用日常人倫；《隋志》點明「經」的經綸天地與宏揚道德之效，乃聖哲所遺留，並為君主教化百姓之道，凸顯出在自然人事上的大用；《四庫總目提要》則說明「經」具有流傳與型儀萬世的性質。經典不僅是王者的行政法度，也是一般百姓行為依循的矩墨，故「經」恆久不變的特性是人主體需要所賦予。雖然我們無法否認「經」確實是傳統制度下施政與拔著人才的準的，但「科舉制度規定儒家經典的教本論地位似乎也對哲學詮釋傳統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是這種作用並不重要，因為科舉考試並不需要體系的建構和創造。」〔註7〕所以「經」之廣佈流傳是源於社會需求，不是制度上的脅迫。

從內容上來看，「經部」是學者依經立論，透過經典詮釋與對詮釋者的再詮釋，構築自己的哲學體系。這些註釋並未受到經典本身的束縛，反而以註解形式申明己見，著書立說。〔註8〕「經」指聖賢所言之書，從孔子對三代歷史文化的重視〔註9〕，及立於「周文疲弊」基礎下使禮樂制度之實質化〔註10〕，傳統文化更新和賦予新的時代意義，並非後起儒者專利，而是自孔子以降便不斷反覆引用與闡述。

至於「子部」相異「經部」之處，且觀《四庫總目提要·子部總敘》云：

〔註7〕 參見劉笑敢，〈經典詮釋與體系建構——中國哲學詮釋傳統的成熟與特點芻議〉，頁37。

〔註8〕 同前註，頁35。

〔註9〕 《論語》中數次提到孔子對於三代文化的重視，如：（一）〈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二）〈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吾能徵矣！」（三）〈八佾〉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註10〕 牟宗三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起源，從對三代文化的反省開始。以此建立原則，能反省的第一人，即是孔子。周代禮樂制度在周公「制禮作樂」下粲然完備，可是發展到春秋以後就產生問題了，故牟先生稱此為「周文疲弊」。儒家在面對「周文疲弊」時，採取積極的態度，使已經形式化的周文賦予新意，讓它生命化，於是提出「仁」的原則綱領，讓禮樂制度有了依歸。詳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中國哲學之重點以及先秦諸子之起源問題》（台北：學生書局，1997年1月），頁45～68。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

《四庫總目提要·儒家類》小序云：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諸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

以上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從著書性質辨別出經、子之別。凡出於六經範圍而立說者爲子書，縱使儒者論述，超越了六經範疇，皆不得列爲經部。其中「經」也包括《四書》、《孝經》、小學等，舉凡聖賢先王著作皆屬之；第二，「經」具有經世普遍性。古代儒者法聖賢先王爲立身處事的準則，通經目的在於適用於世，後來學者依據自身哲學體系，在不同時期學術氣氛下重構經典，縱然可能產生矛盾，但主觀意識上還是要追溯經典原貌。正因爲與具有哲學性質的子部分立，造成現今研究中國哲學者以爲掌握子部內容，就能了解當時學術脈動，而況子部亦有儒家類，易與經部混淆，讓研究者錯以爲儒家哲學悉已含藏其中，卻忽略了經部的哲學思維。我們依照不同時代的反覆闡釋，可以洞悉經典依循的時代軌跡，而「時代性」也正是經、子的共通處，一代哲學思維的掌握，也非得二者並論，始能得其全貌。

此外，礙於「思想史」與「經學史」體裁限制與立論對象不同，我們始終難擇一以窺得哲學思想的完貌。「思想史」以人爲主軸，從思想家生活背景與其哲學理論結合，企圖從社會學並形上學與知識論等任何的角度，還原其思想原貌。至於學術上流變遞嬗，著墨甚淺，同時代思想家彼此間的關係與傳承，多備而寡述〔註11〕；「經學史」則著重經學流派、淵源演變、影響、與相互之間的關係，哲學思維只佔了經學之一部，考證訓詁是另一部份。〔註12〕

〔註11〕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97年4月），頁2。其中云：「思想史除了理論之外，還要了解哲學家這個人，將涉及到他的具體生活、際遇、意識活動，以及他如何面對種種的困境，甚至連他們的悲傷和喜悅，我們都能感受到。」又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10月），頁5。言：「哲學史的主要任務原在展示以往的哲學思想……」上述可知，思想史包括了哲學理論與社會學的外緣背景省察，而哲學史僅就哲學家的純理論作解析，範疇大小有別，相同點則在於皆以思想家爲論述重點，而不以史的流變爲中心。

〔註12〕 經學史與思想史各有所承，立論時選材不一。然而宋明理學乃至晚清，中國

熊十力先生云：「大凡注重哲學思想者。其讀書，於考據方面決不輕忽。而亦決不能如考據家一般精博。因為其為學路向不同。其致力處自別。」〔註13〕指出了哲學與考據學殊途，由於須兼顧二者，故僅能從史學的流變著手。若要深探經學家思維，光靠經學史是不夠的，它只撐起了史學的軀幹而沒有血肉。可是，縱使結合二者之長，仍舊難以還原當時學術原貌。因為史的形式只是概說，又立論設準不一，容易流於武斷。〔註14〕

本文以清初學者《論語》闡釋為立論，思想史的評價雖能廣泛了解詮釋者思想體系，卻不能凸顯《論語》特徵與時代價值；單從經學史論述，能通其學術流派與思想源流，惜又疏於文本的闡釋。統觀當今「論語學史」多從史的流變或目錄學著錄為主〔註15〕，不容易深究經學家整體思維，或採摭歷代官私目錄的評價加以歸納分析，其整理典籍，嘉惠後學之功不可泯，卻寡於考述各家實際思想脈絡。因此，我們若能從時代思潮、思想家本身、文本詮釋等多角度去建構，並以史為輔，方可開創更客觀且深入的研究路徑。

二、問題的提出

學術思想發展到清代，呈現極端的不同理解。有所謂「復盛時代」的說法。認為唐宋以後不尊古義，以致棄古之說的宋明儒學，是經學「積衰時代」，到了清代捨宋說而就漢儒考據，是為近於聖賢之說〔註16〕；另有學者認為滿清的軍事、異族統治，不能繼承中國文化傳統精神，所以明朝以後的學問便毫無興趣談下去了。〔註17〕他們分別站在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支持者的觀點

主要學術思想已籠罩在儒家思維下發展，況經學史本為討論儒學的流變，可與清初以後的思想史內容互為表裡。為能廣含清代學術全貌，凡引述時有刻意區隔屬於經學或思想者除外，撰者咸以「清代學術思想」統稱清代經學或思想，特此註明。

〔註13〕 語見熊十力，《讀經提要》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4年7月），頁441。

〔註14〕 此非意指史的不重要，無論是思想史或經學史，皆是了解學術的門徑。治學路徑有二，不外是先博覽以歸納，或是先知其要義而演繹，從史處著眼屬於後者。雖先掌握其學術精要，但我們必須了解著者的立論依據，避免盲從依附而不見學術真實面貌。

〔註15〕 如王鵬凱，《歷代論語著述綜錄》（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仿《漢書藝文志》體例，將漢到清的《論語》著作進行整理，並考述各派源流以及張清泉，《清代論語學》（台中：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等書，皆是將《論語》文本注解加以著錄分析。

〔註16〕 參見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8月），頁299～385。

〔註17〕 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418。